

Zhengping Chen ( )

Lectures and Readings

Lecture 1

---

## 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 GDP 估算

陈争平

(清华大学历史系 100084)

1980 年代以来,吴承明先生曾多次强调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sup>!</sup> 计量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更好地展开横向的国际比较和区际比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纵向的异时段比较,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史中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分析有多种,其中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是衡量历史上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能更好地进行纵向及横向的比较研究,有关 GDP 的估算及相关研究最能考验研究者的综合能力。《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中国经济史中 GDP 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分析的运用。

—

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 估算要求在收集整理较为系统全面的一定时期内经济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估算,难度较大,尤其是历史上的 GDP 估算。一般来讲,历史越久远,进行 GDP 估算收集经济统计资料的难度越大。所以关于中国现代 GDP 估算,既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整套数据,又有世界银行的估算,还有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估算,可以多方参照,而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的 GDP 估算则相形见绌。

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 GDP 作了估算。从 1995 年夏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以一桥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有关亚洲(包括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的研究(简称“COE”项目),按其计划最终成果将包括近现代中国 GDP 估算。

近年来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知难而上,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管汉晖估算了明代 GDP<sup>”</sup>,刘光临测算了宋明间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sup>#</sup>,2010 年 7、8 月有刘逊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和李伯重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两部重量级专著问世。刘逊通过对 1600—1840 年中国人口、耕地、农业产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等经济总量进行较为细致的考量,认为麦迪森的宏观数据存在较大随意性和误差。刘逊估算结果:和以往麦迪森等人的乐观估算不同,1600—1840 年这 240 年中国实际 GDP 的增长十分有限,年均增长率只有 0.18%;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1600 年为 1/4,1820 年降为 1/5,1840 年不到 1/5;中国人均 GDP 在 1600 年时大约为英国的 40%;1820 年不到英国的 1/5,略超过美国的 1/4;1840 年为英国的 16%,美国的 1/5。从整体上看,从 1600 年至 1840 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sup>\$</sup> 李伯重对 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农业、工业和服务产业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华娄地区 GDP 估算和 HDI 评估及与 19 世纪初荷兰进行国际比较。李伯

<sup>!</sup>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有关章节,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sup>”</sup> 管汉晖《明代 GDP 试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报告 2007 年。

<sup>#</sup> 刘光临《宋明间国民收入长期变动之蠡测》,《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 年第 3 期。

<sup>\$</sup> 刘逊《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1、149—150 页。

重估算结果:1820 年代华娄地区 GDP 大致为 1 350 万两 ,人均 GDP 为 24 两;19 世纪初期的华娄城市化水平很高,“过去那种把 19 世纪初期的华娄视为农业社会的看法 ,确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华娄的国民财富分配比荷兰更为公平 ,华娄经济比严重依赖投机性的海外投资和海外掠夺的荷兰经济更为健康;而 1820 年以前华娄的 GDP 比 1820 年代华娄的 GDP 要高出近 30% ,“对于华娄经济而言 ,

计、历年铁路各主要干线货车利用状况统计、历年铁路客货运输量统计、历年铁路客货运输成本与收入统计、历年公路客货运输量统计等,可进一步作各类运输方式的比较、中外交通业资本比较、交通运输业新旧更替分析、新式交通运输业发展与工业化关系分析等。在各行业各部门统计集成基础上再进行各阶段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等分析,并进一步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诸如分析铁路和公路两大近代陆运方式与水运方式的互补及替代关系,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因为近代中国自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关于自然经济部分估值的方法,可为我们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提供可贵借鉴,我们必须对自然经济部分作适当估值。我们再将些经过甄别、修正、插值、估值形成的新统计表,以及进一步的计量分析等,汇集成另一整套近代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B 库)。

在两套数据库建设的同时,建议分部门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进行综合研究和国际比较,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例如在交通物流方面,分析铁路和公路两大近代陆运方式与水运方式的互补及替代关系,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汇集为《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丛书。

这是一项规模较大,多学科结合,填补学术空白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所建设的两套数据库及系列分析等将有较大创新意义,将为学界在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等方面后续系列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石。

### 三

《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丛书,拟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财税》、《通货与金融业》、《矿冶业》、《重化工业》、《轻纺工业》、《建材、建筑业》、《农业!》、《交通物流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物价》、《人口和劳动》、《综合》等卷,其中有些卷将视篇幅大小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受李伯重对 1820 年代华娄地区工业计量分析的启发,再对照巫宝三等关于 1933 年国民所得的研究,笔者初步认为以往关于近代中国工业产值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建材、建筑业产值,应当将《建材、建筑业》单列成卷,要广泛收集资料,花较大篇幅探讨乡镇及农村建筑实情。

《综合》卷是在前面讨论基础上,使用 SNA(国民账户体系)进行综合计量研究,以利于横向国际比较及纵向历史比较,为此《综合》卷将以生产法为主,辅之以收入法和支出法,估算中国近代历年 GDP、人均 GDP 等综合性指标,并进行分历史阶段、分地区的考察;还将进行各阶段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等分析,再作国际比较研究。《综合》卷将是整个项目收口的关键,应具有画龙点睛功效。

### 四

GDP 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各部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又都要用货币来衡量,GDP 估算与货币、物价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各阶段各地区各类物价变动极为复杂,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飞涨,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变化轨迹相差极大,所以进行中国近代 GDP 估算一定要特别重视物价的实际变动,否则将会有很大误差。上述两库一丛书要重视物价资料的收集、考证和相关分析。王玉茹曾编制了 1867—1937 年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果为刘逊等学者所引用。但是王编 1867—1937 年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前一段系唐启宇指数,后一段系沃尔赛姆指数,"而对这两段指数的追踪考察发现问题很多,尤其是唐启宇指数实际上是唐编晚清海关进出口物价指数,仅进出口物价而言这一指数就存在较多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由何廉领导的南开大学研究团队在历年海关关册统计数据基础上,经过繁杂的计算,编制了 1867—1936 年中

! 指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养殖业。

" 王玉茹《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 页。

国进出口物价指数。<sup>1</sup>南开这一套指数以后几经修改,前后发表的数据有较大出入。南开指数发表20多年后,姚贤镐另行编制了1867—1894年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指数,并据此对1873—1894年中国进出口价格变动的剪刀差作了分析。<sup>2</sup>70年代又有海外学者侯继明(Chi-Ming Hou)根据1904年后海关实行的进口起岸价和出口离岸价,对南开指数进行了部分的调整。<sup>3</sup>后来台湾学者王良行在进行近代上海贸易条件研究时就根据侯氏指数计算。<sup>4</sup>我们应当博采众长,经过更加细密计算,编制出更加合理的近代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另一方面,虽然晚清进出口物价对全国批发物价有很大影响,但是直接用其代替批发物价总指数也是不妥的。因此,我们仍然须花大力气多方收集资料。清代粮价资料弥足珍贵,可资利用。刘逖在估算1600—1840年综合物价指数时,取米价权重为75%,金价权重为25%。<sup>5</sup>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可供我们参考,清后期粮价应当比进出口物价在综合物价指数中占有更大的权重,民国时期进出口物价的权重应当增大。此外,近代北平社会调查所、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术机构,很多政府机构等都有关于各类物价的统计调查,近代很多方志、笔记、经济期刊、有关年鉴等都有物价资料,彭凯翔认为“民国时贤已在估测整理一般物价指数方面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sup>6</sup>,我们应当好好利用这些工作成果,应将多方收集的近代物价资料列入A库,再将经过考证、插值、初步分析得出的有关物价统计表(包括重新编制的近代中国综合物价总指数表)列入B库,丛书《物价》卷则开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研究。

物价变动受货币供求关系制约,近代中国货币运动也是十分复杂,为此《通货与金融业》卷将花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研究。笔者认为,刘巍、燕红忠等在近代中国货币供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sup>7</sup>但是狭义货币理论难以很好地分析复杂的近代货币运动,应当用广义货币理论分析,由于篇幅有限,对此将另文阐述。

## 购买力平价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王玉茹 王 哲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购买力平价理论(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简称PPP)是汇率决定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假说之一,是世界各国制定汇率政策的依据。国际组织亦基于PPP理论横向比较各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如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ICP(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上述的横向比较以及由此制定的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完全取决于“PPP理论在历史以及现实实践中是否成立”。PPP理论自其创建之日起就不断经受学界的各种理论探讨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证检验。

学界对购买力平价学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的论著较多,一般认为,短时间尺度上购买力平价理论难以成立,而在长时间尺度上成立的实例则较多。这是因为汇率是一种资产价格,它能迅速对市场进行反映;相反,市场上商品价的整体价格水平具有粘性,它的调节则相对较慢。

<sup>1</sup> 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376页。

<sup>2</sup>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1页;姚贤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sup>3</sup> 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3,P.198。

<sup>4</sup> 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sup>5</sup> 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sup>6</sup>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sup>7</sup> 例见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分  
分  
GDI  
二、

统计指标的核算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如管汉晖、李稻葵对于明代 GDP 的核算<sup>①</sup>,刘逖对于中国前近代经济总量的研究<sup>②</sup>,李伯重对于 1820 年华亭一类县地区 GDP 的研究<sup>③</sup>等。除了运用统计核算或产量价格测算等会计方法来估算中国历史上的 GDP 之外,还出现了用计量模型推算历史 GDP 的学者<sup>④</sup>。对于这些探索,有些学者给予了肯定,但也指出不能迷信 GDP。<sup>⑤</sup> 本文拟就中国历史上的 GDP 研究的科学性和误区提出一点粗浅的思考,特别是对于 GDP 是否能够被作为主要的普世价值标准来进行跨国别、跨社会、跨时代的比较研究提出我们的观点。

### 一、GDP 的定义和规范运用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对于 GDP 的定义主要为:GDP 指的是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sup>⑥</sup> 更为细分的定义还有“名义 GDP”和“实际 GDP”等。

我们先大致简述一下 GDP 核算的发展历史,以便更好地了解 GDP 本身作为统计工具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在 1936 年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开创的。其所用的分析框架中所包含五个内生变量:国民收入、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利率,作为总量分析的指标。<sup>⑦</sup>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伴随的是凯恩斯学派在经济政策应用上的盛行,美国政府也需要 GDP 这类数据指标作为经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依据。如弗叶所说,“大萧条以及政府作用在经济中的增长,提出了对于国民收入账户这类度量迫切的需要,并且导致了其

经济核算指标。因此,作为现代 GDP 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其适用的基础以及范围:

其一,GDP 等一整套的核算体系,是与现代官僚体制的国家对于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联系,并且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产生的,特别是需要有统计和经济决策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的设立。

其二,GDP 应该是通过理性化的核算体系统计出来的,而不是估算出来的。因为中国古代、近代没有统计,学者们只好进行估算,但这种估算本身就是一种偏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偏离最小。

### 二、对 GDP 定义的认识误区

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可以说是对 GDP 定义认识误区开了先河。本来,GDP 的定义是所有进入市场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没有进入市场的则不应该计入,但《中国国民所得,1933》把没有进入市场的一部分物品也计入进来。该项研究以净产值的估算数掉换了“市场价值”的概念,并且以“所能支配的货物与劳役”的定义来替换“进入市场”的定义。<sup>⑧</sup> 农业和手工业都是如此,不论是否进入市场,都因为是“所能支配的”而被列入了估算。<sup>⑨</sup> 刘大中和叶孔嘉以及罗斯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重要

- ①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 GDP 试探》,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3)。
- ② 刘逖:《1600—184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载《经济研究》,2009(10)。
- ③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华亭一类县地区 GDP 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
- ④ 代表人物为刘巍、陈昭。其相关著作有专著《大萧条中的美国、



的实

- 17.

[illegible]

一、万世之

《历史统计》(1993)对清代人口与 GDP 进行了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1.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2.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3.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4.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5.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6.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7.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8.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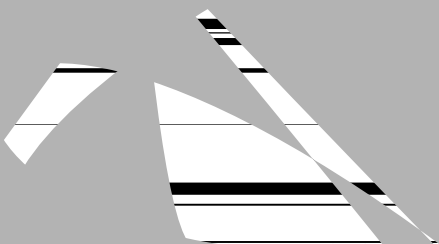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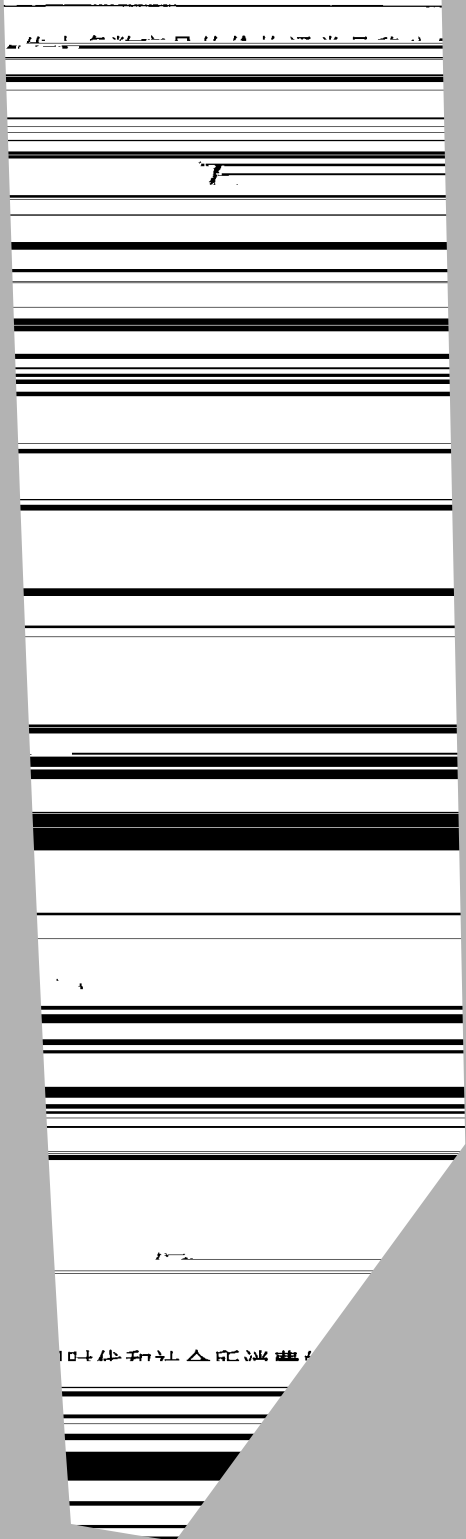
9.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10.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11.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12. 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1600 年的人口与 GDP 估算,以 16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1820 年作为结束年份。

避免的问题,如清代中期的版图与明代甚至清初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认为由于新增国土人均密度较小(不到 2%),对 GDP 估算影响相对较小。而且通过上述 GDP 数据可进一步验证统计史的变迁中,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刘逖指出,麦迪森研究的一个基本错误假定,即从明代中期一直到清代中期(1500—1820 年),中国人均 GDP 未发生过变化。按 1600 年中国人均 GDP 估算为 300



还

